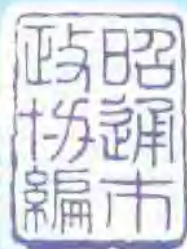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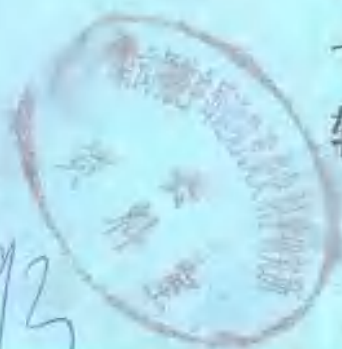


昭通文史資料選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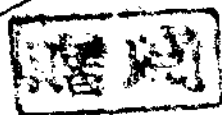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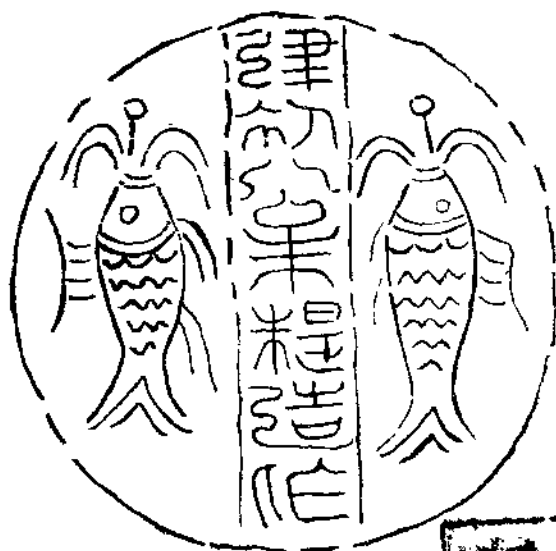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輯



92

昭通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七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云商省昭通市委员会

一九九三年三月

封面设计：谢允鉴

封面题签：姜亮夫

责任编辑：贺以明

编辑委员：（按姓氏笔划排列）

严斯信 陈云涛 杨 鹏

贺以明 姜正夫 黄济舟 谢允鉴

誉稿校对：冯文忠

昭通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七辑

昭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内部刊物

四川自贡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 字数：15万

工本费：2.20元 邮 编：657000

7-1531.7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昭通市第三届委员会

委员姓名录

主任委员：贺以明

副主任委员：杨 鹏

文史委员：（按姓氏笔划排列）

冯文忠	伍正之	朱振仁
严斯信	李世闻	李润民
杨 鹏	陈云涛	贺以明
姜正夫	黄济舟	谢允鉴

封面说明：

双鱼洗圆形图，系卅年代昭通出土的东汉双鱼洗临摹图。其文为：“建初八年朱提造作”（建初八年为公元83年）。此洗系昭通考古学家张希鲁先生访获珍藏。现藏昭通行署文化局。

横纹系汉砖花纹。

目 录

经 济

- 昭通经济开发简史.....曹吟葵(1)
- 昭通的农业科技.....曾容祥 田 柱(61)
- 解放以来我市粮食产量与再翻一番.....田 柱(69)
- 昭通市解放前后的水旱灾害.....李春平(74)
- 昭鲁河治河史志略.....王复政(80)
- 明清时期的今昭通木政.....陈序德(84)

历史人物

- 龙云治滇十八年.....温 雄(91)
- 邹炯生平事略.....邹长铭(122)
- 祭冰姐.....马仲明(141)
- 刘常星先生传略.....贺以明(142)

民族宗教

- 昭通天主教简史.....黄 锐(145)
- 昭通——近代滇东北苗族文化发祥地.....苗 笛(154)

文史鱗爪

- 《孟孝琚碑》译释.....陈孝宁(167)
- 龙洞碑记.....曹吟葵(176)
- 读史钩沉二则.....陈本明(179)

忆丙辰清明昭通人民悼念周总理诗.....	陈剑宁 (182)
再访第60军抗日战场禹王山.....	徐一鸣 (185)
龙志桢墓表.....	(193)
60军抗日轶闻.....	杨 鹏 贺以明 (195)
名特食品——昭通酱.....	万治平 (201)
东汉《孟孝琚碑》浅探.....	陈孝宁 (204)

**补白诗十一首 (60、90、140、144、175、178、184、192、
200、203)**

昭通经济开发简史

曹吟葵

一、引言

犹溪、赤木，盘蛇七曲。

盘羊乌桕，气与天通。

看都濩泚，住柱呼哧。

庾降贾子，左担七里。

这是《华阳国志》里留下的，描写古代从宜宾到昭通路途艰险的《行人歌》。它形象地记录了古代人民经过这段“蜀——身毒”道的情况。试解释如下：“犹溪、赤木，盘蛇七曲”，犹溪、赤木的河水，蜿蜒曲折地流着。“盘羊乌桕，气与天通。”绕着羊肠路的乌桕山，气势雄浑与天相接。“看都濩泚，住柱呼哧。”看着山道上的行人都累得淌汗，用“打杵”撑着背上的货物歇下来，呼出一口长气。濩，流散貌。泚，汗出貌。柱，即柱仗，昭通方言俗称“打杵”。呼哧，歇气时随口呼出的声音。

“庾降贾子，左担七里，”庾降的客商，左肩挑担（走在险狭的栈道上，不能换肩，）要挑七里路。庾降，按《三国志》注：“庾降地名，去蜀二千余里，时未有宁州，号为南中。”贾子，即客商。贾，读古。

这首《行人歌》描绘了古代昭通地区险阻难越的山川，商旅

往来的形象，其实可信。但，这些高山大川阻隔不了古代昭通人民与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联系。从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看，在远古时期，昭通地区就有人类生存。而它作为伟大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份，也曾经过原始社会——奴隶社会——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。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，在开发建设它的发展过程中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就以古代交通来说，虽然道路艰险，但它并不与世隔绝。它曾是祖国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。北承中原经济文化，南启云南交通孔道，是最早振兴云南经济的起点。中原经济文化，经过这里，一站站地传输到滇中。又由滇中延伸到东南亚各地。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，形成了汉晋时期灿烂的朱提文化。东晋末年，朱提郡人大量西迁，把朱提文化带到了滇中和滇西，与滇文化结合，形成了大理白族文化的基础，使后来西爨的兴起和唐代云南经济中心转移到滇西，有直接的影响。

昭通地区地理位置，就目前来说，它处在云南省的东北部，与川、黔两省犬牙相错。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《禹贡》中，它属于古“梁州”。周为蜀国地，秦为蜀郡所辖。秦开“五尺道”在此置吏。西汉武帝时，开郡置县，属益州部犍为郡。后置犍为南部都尉，辖朱提（今昭通、鲁甸），南广（今四川高县及盐津、镇雄），汉阳（今贵州威宁、赫章），堂狼（今东川、会泽、巧家），存郛（今宣威）。东汉改称犍为属国，辖朱提、汉阳二县。三国时，蜀国在此置朱提郡，辖朱提、南广、汉阳、堂狼、南昌（今镇雄地）五县。晋、南北朝因之。隋置恭州，唐初置曲州，延至唐贞观四年，或为郡或为县，称朱提凡760年。唐、宋、元、明及清初称乌蒙、芒部，凡1100年。清雍正九年（公元1731年），始改名昭通至今。

纵观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史，在汉以前的古代历史长河中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。汉至唐初的朱提，记载也甚简略。元、明时期虽置路置府，仍少文学记载。在历代王朝时期，兴衰

交替，有前进有没落，有光明有蒙昧。汉代对它的开发，诸葛亮的“抚和”政策，使这个地区经济文化得到发展。东晋的残酷镇压，唐、宋王朝的羁縻之治，使它落后了几百年。在社会经济开发上，真正能够影响后世的，应是清雍正“改土归流”，隶属云南省后的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专家，不乏其人。但对昭通地区经济文化史，却少有涉及。这样，就为我们系统地整理昭通的经济社会文化史，带来了困难。因此，即使尽可能地利用历史记载，参考文物考古资料，在很多问题上也不得不留下空白点。

当前，开发建设川、滇、黔交界地区的宏伟蓝图，已为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所通过。攀西——六盘水开发区（即汉代朱提郡及越嶲郡、建宁郡的部份地域），已列为全国19个重点开发区之一。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份。昭通地区是这一开发区的腹心地带。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，认识昭通的过去，对于我们今后建设它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笔者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为了不湮没前人对昭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的功勋，不揣冒昧，写出这篇短文。为的是提供历史资料，使我们在开发昭通，建设昭通，振兴昭通的事业中，继往开来，为建设本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。

史料使用中，难免有不随俗的地方，请提出意见，共同探讨。

二、朱提经济文化的兴衰

1. 古朱提探源

昭通古称朱提，这已为文献及考古资料所证实。这两个字的读音，在古代读为“殊时”。以朱提为县名，这是汉武帝时的

事。史载：“武帝建元六年，置犍为郡，领县十二。”其中有朱提的县名。这因当地有朱提山、朱提江而得名。古朱提的范围，大致包括今宜宾地区长江以南、昭通地区及贵州威宁县的地域。这里有巍峨的高山，有深陷的峡谷。有起伏的丘陵，有肥沃的坝子。加之海拔高度悬殊，气候的垂直变化显著。因而动植物的种类繁多。几乎包括了从亚热带、温带至寒带的生物群落。这种丰富多采的自然环境，就为古代生产力低下，经济类型单一的民族，创造了劳动生息的有利条件。

根据考古发掘资料，昭通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。1982年，在昭通市北闸过山洞内，发掘出一枚人牙化石，经鉴定，其年代在距今五万年到十万年之间。其生活的时代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后期，属于“新人”类型。人类由“古人”进化到“新人”。原始社会便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早期阶段。过山洞人牙化石，是“新人”阶段最早的人类化石。学术上命名为“昭通人”。它与1951年在四川资阳发现的“资阳人”，同属一个时代。由于它是“古人”与“新人”的继往开来者，因而对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，有着重要的意义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昭通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，早在五万年前，昭通坝子里就有人类劳动、生息、繁衍。

距今约一万年左右，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。这时期的遗址遗物，在昭通地区各县都有发现。这又说明到了新石器时代，昭通地区很多地方已有人类生存。1956年，昭通市北闸官寨乡过山洞附近的耕地里，出土了一批夹砂红陶残片，从形状上可辨认的有陶鬲、陶鼎、卷口陶罐等。砂粒较粗，火候不高，厚薄不匀，大都为捏制。其中一片壁内有篾纹，当系篾胎烧制，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遗物。鼎和鬲是中原器形的特点。这批器物显示了中原文化对昭通地区的影响。鲁甸马厂遗址出土的三件泥质黑陶，又呈现出火候甚高，打磨光滑，为云南其他地方所未见。近

年来，鲁甸县野石村发现了面积达一平方公里的大型村落遗址。这是古代“千顷池”区域，有“邑聚”的居民点。磨制石器中的石刀，有段石斧，多为天然石磨制，扁平梯形，各县时有发现（当地人呼为雷楔子）。这些古遗址、古器物，大多分布在小河附近的台地，它前临河水，后面靠山。表现了新石器时代昭通的先民，已逐步离开洞穴而居住在河边或坡地，从事着采集渔猎的生活。

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，昭通地区主要是僰人的聚居地。以四川宜宾为中心，向南延伸，沿朱提江（今洒渔河、大关河、横江），僰水江、南广河两岸的峭壁上，至今尚有僰人悬棺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，犍为郡僰道县，应劭注：“故僰侯国也。”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犍为郡僰道县说：“本有僰人，故《秦纪》言，僰僮之富。汉民多，渐斥徙之。”僰道县即今宜宾市。古僰人区域，以僰道县为中心，散居南境，时代较早。

僰，《说文》的解释是：“僰，犍为蛮夷也，从人棘声。”《水经·江水注》引《地理风俗记》说：“僰于夷中最仁，有人道，故从人。”所谓“最仁”，“有人道”，应该理解为这种民族文化发展的水平较高。僰族的经济，主要从事农耕。笔者认为，他们最早栖身的地方，荆棘丛生，虎狼出没。他们披荆斩棘，开荒拓野，从事耕作，建造家园。是在荆棘丛中战斗出来的人，所以用“棘人”合成僰字。僰人是创造朱提千顷池文化的先民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永昌郡传》说：“朱提郡，在犍为南千八百里，治朱提县。川中纵广五六十里，有大泉池水，僰名千顷池。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，与僰道接。”这个以千顷池为中心的广大地区，也是“古僰侯国也。”相传蜀王杜宇，即生于朱提。汉代杨雄写的《蜀王本纪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……有一男子名曰杜宇，从天堕，止朱提。有一女子名利，从江源井中出，为杜宇妻。乃自立为蜀王，号曰望帝。”《华阳国志》说：“后有王

曰杜宇，教民务农，一号杜主。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，宇悦之，纳以为妃。……杜宇称帝，号曰望帝。……自以为功德高诸王，乃以褒斜为前门……以汶山为畜牧，南中为园苑。”

关于杜宇为蜀王的事，四川上古史有专著，本文不作详细论述，所引上文，^⑤目的在说明以下四个问题，它与朱提的经济发展有关。其一，杜宇“从天堕，止朱提。”排除神话因素，杜宇是生于朱提的不同凡响的部族首领。如前所述，朱提的主要民族是夔人。从事农耕。杜宇能“教民务农，”他应该是夔人的酋长。他在与广大夔人一道开发朱提时，积累了从事农耕的经验。其二，杜宇到了蜀地后，教民务农，得到蜀民的爱戴，以至“巴、蜀民农时先祀杜主。”为什么“教民务农”的杜宇能够称帝，这是因为，在杜宇称帝前，蜀国的农业还很落后。那时的蜀王为“鱼凫王”，史载：“（鱼凫）王猎于湔山，便仙去，今庙祀之于湔。”湔山在今灌县境内。“鱼凫”，是一种善于捕鱼的水鸟，经人驯养后，能为渔人服务，今俗名“水老鸱”。蜀族可能当时驯养此凫捕鱼，故用为图腾，称鱼凫氏。当蜀族鱼凫氏进入湔水之时，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水域，故能捕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后来发觉在水域周围局部丘陵可以住人，渔户就会因捕鱼之便，迁居来住。从而开始了试行耕种，逐步拓展，终于开辟了成都平原，以至于建成蜀国。但其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下。这时，具有朱提先进农艺的杜宇氏，带着夔人到了成都平原，很快地发展了农业。所谓“教民务农”，即教鱼凫氏的蜀民从事农耕，使蜀国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，因此，杜宇得到蜀民的拥戴。正当鱼凫王“猎于湔山，便仙去”的时候，继鱼凫王成为蜀王望帝。这则史料一是说明蜀王鱼凫氏是渔猎民族，没有朱提千顷池农耕先进，一是证实了蜀地与朱提的经济交往时间很早。其三，从杜宇生存的时代，可推知夔人开发朱提的时间。《蜀王本纪》说：“望帝积百余岁……时玉山出水，若尧之洪水，望帝不能治。使

“鳖灵决玉山，民得安处。……乃委国受之而去，……鳖灵即位，号曰开明帝。”鱼凫氏不能农耕，让位给望帝杜宇氏，杜宇氏不能治水，让位给开明氏。史载开明帝传位十二世为秦所灭。秦灭蜀是在公元前316年，若平均每世以30年计，那末杜宇族让位给开明族应在公元前676年，相当于西周末至春秋中期。此可证明，在西周末年，朱提“千顷池”区域，已经开发了农业经济。其四，杜宇族建立蜀国，“以褒斜为前门……以汶山为畜牧，南中为园苑。”这是蜀国直接统治区域的南北界。褒斜在今陕山南部，汶山即岷山，在今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自治州。南中为今云南及贵州。“南中为园苑。”说明朱提为蜀国的一邑。其后，开明族保子帝，依然“雄张僚樊”。此在战国初年（约当公元前五世纪），是时犍为樊道县以南，即今昭通地区，仍为樊人聚居区。

综上所述，昭通地区在远古时代即有人类生存，西周后期樊人已开发了农牧业经济。在地域上为蜀国境内的樊侯国部落。以樊道县为中心，向南延伸是樊人的聚居区。他们以农耕为主，开发了朱提千顷池的农业经济。

2. 秦、汉开道置县

公元前316年（秦惠文王后元九年），秦大夫张仪、司马错、都尉墨等伐蜀，蜀王开明氏败绩。蜀平，司马错等又取巴。于是秦在巴、蜀之地设置了巴、蜀、汉中三郡。秦灭蜀时，樊道王据守横江，与秦兵作战。横江是人朱提的门户，横江以南是樊人的聚居区域。所以沿江设有驻兵的营寨，叫做“兵栏”。樊道王战败后，秦兵烧毁兵栏。樊人被排斥，一些樊人成了俘虏，一些樊人被迫逐到滇东北和滇中地区，成了“滇樊”。所以汉初的樊道县已少樊人了。

秦在稳定了对巴、蜀的统治后，开始对西南地区的开发。首先从修筑道路入手。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。李冰担

任蜀守期间，即开始由犍道县顺江开山凿岩，修筑通往滇东北地区的道路。这一带山岩险峻不可以凿，李冰采取了积薪烧岩的办法。岩石经过火烧，质地变松，容易开凿。这种烧过的痕迹，直到晋代还很明显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烧过的山岩有红白五色影子映入水中，使江中上游的鱼“至此而止”，不敢再前进。这是修筑“五尺道”的开始。
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为了进一步略通云南，他派遣常頌继续修筑这条道路。常頌把李冰原来从犍道县修筑的道路向前延伸，经朱提至建宁（今曲靖），全长二千余里，由于道路宽仅五尺，故史称“五尺道”。这条道路尽管较狭窄，但它对开发云南，巩固秦的统一都是有利的，朱提成了秦郡县联系西南夷地区的枢纽。略通“五尺道”，秦派遣官吏对西南夷的一些部落进行直接的统治。即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所谓“诸此国颇置吏焉。”文献记载中没有留下这些置吏郡县的名称。但我们可以根据地理环境设想。从犍道县起，沿“五尺道”南伸，朱提是这条道路上彝人重要的聚居区，且广阔的坝子，是农耕的好地方，经济较其他部落发达。如果当时秦在西南夷地区置吏，舍此其谁。因此，笔者认为朱提是秦王朝在开发南中“置吏”的第一个经营点。“五尺道”的开辟，进一步加强了内地对云南的经济文化交流。四川的铁农具输送到了朱提。1941年在昭通县东石门坎（属贵州威宁界）发现“蜀郡千万”铁锄。1954年在鲁甸汉墓封土中发现“蜀郡成都”铁锄。两器大小形制相似。“蜀郡”为秦置四十郡之一，以地名及书体推考，实属秦器。这就是从“五尺道”输入的。这些铁农具的输入，促进了当时昭通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
秦亡以后，“五尺道”废。西汉时西南夷地区的经营，曾一度中断。这是因为秦朝末年大规模的战乱，使中原社会经济，遭到极大的破坏。西汉王朝初建立，为巩固其新政权，有意采取了

使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。史记说：“汉兴，闭蜀故徼。”关闭了四川和边远地区的经济往来。直到高后六年（公元前182年），才在樊道县建城，设置关市，为进一步开发西南夷作准备。西汉经过“文景之治”，经济迅速发展，政治空前强大。武帝刘彻统治时期，汉王朝的中央集权高度加强，经济力量足以驾驭各地。当时的西南夷地区，特别是樊道县以南地区（即今昭通地区），各族人民并不因“闭蜀故徼”而中断彼此间的经济往来。而四川商人“或窃出商贾，取其笮马，犍僮，旄牛，以此巴蜀殷富。”四川出产的盐、铁器，布匹源源不断输入西南夷地区。巴蜀经济文化影响着西南各族社会的发展，而西南夷又丰富着巴蜀的经济文化。所以，在西南夷地区复置郡县，“开蜀故徼，”已成为西汉王朝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
公元前135年（汉武帝建元六年），武帝采纳了唐蒙通夜郎道设置官吏的建议，派唐蒙为中郎将，率领士卒千人，后勤部队万余人，从巴符关（今四川合江）进入夜郎，赠给夜郎王大批财物，又宣扬汉王朝的威德，商定置吏，并许给夜郎王子为令。夜郎旁的其他部落，贪图汉王朝的“缯帛”，也同意唐蒙置吏的主张。当唐蒙回到京城长安后，汉即在这一地区设置了犍为郡。接着又征发了巴蜀士卒，修筑从樊道县至牂牁江的道路。史书上称这条道路叫“南夷道”。

犍为郡的设置，只是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开始。公元前130年（武帝元光五年），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为使臣，仍然采取赠送礼物给“西夷君长”，招抚了邛笮等部落，设置了十余县。当时由于在“西南夷”地区修筑道路费用浩大，曾引起朝廷内的争议。《史记》载：“当是时，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，戍转相饷，数岁道不通，士罢饥离湿，死者甚众。西南夷又数反，发兵兴击，耗费无功。”开通南夷、西夷二道，巴蜀之民负担加重，且士卒死者甚众，引起了怨恨，使其难以进行。加之当时北方匈奴

族对汉的威胁最大，故采取收缩力量，专对北方的策略。“上罢西夷，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，稍令犍为自葆就。”这是政治形势所决定。

对西夷暂时罢去不管，独置南夷夜郎两县。夜郎在今贵州安顺地区，南夷在何方？1932年，昭通县洒渔河汉墓发现一枚“南夷长史”铜印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载：“郡守掌治其郡，有丞。边郡有长史，掌兵马。”掌兵马的“南夷长史”铜历在洒渔河发现，是否当时南夷县设在朱提境内，有待今后发现其他史料作进一步证实。

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，当时称为“初郡”或“边郡”。它与内地郡县不同，初郡官吏士卒的俸食及用度，都由邻近内地郡县供应，不在本地征收。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说：“元封二年……汉灭两越，平西南夷，置初郡十七，且以其故俗治，毋赋税。”这是因为初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，生产生活较低，提供不出同内地郡县一样的赋税。所以暂用当地习俗治理，不收赋税。犍为郡当时就是初郡。

在“西南夷”地区置郡县后，加重了邻近郡县的负担。《史记·平淮书》有：“……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，乃募豪民田南夷，入粟县官，内受钱于都内。”由于负担犍为等郡县的供给，四川所收租赋不够，汉王朝招募内地“豪民”（大商人）到“南夷”地区垦荒，以屯田收获的粮食缴给当地官吏，而在王朝中央内府支取粮价。这是一种商屯的办法。这种移民屯田，使一些具有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内地汉族人民，大量南移，使南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发展。又由于驻戍士卒不能按时更换，他们也从事一些屯垦，时间长了，形成了军屯。这些政策对于促进民族接近，推动生产发展，稳定边疆都是有利的。武帝元封二年，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益州郡后（今昆明地区）为便于对“南夷”这个特殊地区的治理，从犍为郡划出以僰人为主的南广、朱提、汉阳、

堂狼、存鄂五县设置“犍为南部”，设都尉掌管，它包括了今四川宜宾地区南部、云南昭通地区、宜威、会泽、贵州威宁、赫章的地域。

秦、汉之际，滇中与四川的交通，主要是通过滇东北，犍道县是秦汉开发南中的经营点。秦汉修“五尺道”和“南夷道”，都以犍道县为起点，向南延伸，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，而朱提是这个交通线上的枢纽。

综上所述，秦开“五尺道”，汉修“南夷道”，通南夷，置郡县，开发了西南广大边疆，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，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当时的昭通地区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之下。汉文化的传入，商品的自由运销，移民屯田，汉民族先进技术和耕作方法的传播，加强了古代昭通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，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3. 朱提社会经济

犍为南部都尉治理滇东北地区计216年。到了东汉永初元年（公元107年），省犍为南部，改称犍为属国，领朱提、汉阳二县。汉代的属国，是“分县治民比郡”，“似郡差小”。《续汉书·职官志》说“每属国置都尉一人，主蛮夷降者。”也就是说，属国的统治对象，主要是被征服威强迫迁徙的少数民族。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，这时的犍为属国有7398户，37187丁口。它与犍为南部时比较，南广划归犍为郡，朱提包括堂狼，汉阳包括郁鄂。东汉是犍为属国社会经济空前发达的时期，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，水稻种植和矿冶技术都很发达。

首先是农业。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。在古代唯有农业发展以后，人们才可能有定居的环境，才可能为畜牧业、手工业的兴旺和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创造出有利的条件。从原始社会开始，随着人们征服自然力量的逐步扩大，朱提